

目 录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关于当前文史资料工作的安排	(1)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3)
六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情况	(4)
六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发言摘登	(4)

· 经验交流 ·

密切各方联系 扩大征集渠道	宜城县政协文史委 (6)
把握政协特点 发挥本地优势 开展文史资料工作	查代安 (8)
我县1987年文史征集工作是怎样突破百万字大关的	江势涛 (10)
对知情人要知情	襄阳县政协文史委 (12)
开拓视野 广征史料	李剑勋 (13)
核实文史资料管见	张敬初 (15)

· 各地动态 ·

总结经验再鼓干劲 明确方向再攀高峰	襄樊市政协文史委 (17)
王任重副主席为老河口文史资料题词	邓天友 (18)
《鄂西文史资料》第六辑问世	鄂西州政协文史办 (18)
汉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举行致聘人士座谈会	汉川县政协文史委 (19)
《京山文史资料》出版专辑纪念辛亥革命志士	徐邦杰 陈仕文 (19)

· 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

第十九届“国联”会议在武汉	余秋阳 (20)
宜昌、武昌兵变	田锡富 (22)
严立三与藏书游家河岩洞	曹起泽 (23)
鄂西人民为辛亥革命胜利作了重要贡献	鄂西州政协文史办 (25)
漫话筵席捐	陈启铭 (26)
民国时期湖北军事人物小传	徐怨宇 (27)

· 自由谈 ·

从二律背反中走出来——论史料的文学表现手法	丁声明 (30)
-----------------------	----------

· 楚天风物 ·

孔庚和武昌岳飞亭	刘作忠 (32)
----------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关于当前文史资料工作的安排

(1988年7月5日第7次主席会议批准)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重要日常工作之一。它的开展,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本届委员会是在历届委员会特别是六届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基础上成立的,我们应该认真吸收各届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根据当前形势的新特点,继续推动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

六届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坚决排除文史资料工作中“左”的干扰,确立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方针,从而使文史资料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首先,明确了文史资料工作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服务的方向,提出不论何种阶级、何种党派、何种信仰,凡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对国家、对民族作过重要贡献,或者在学术上、事业上有过重要建树的人士,都应积极征集出版他们的资料。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征集出版大量爱国民主人士和各方面学有专长的知名人士的资料,并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述,从而进一步树立了文史资料的信誉,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面。第二,发挥了文史资料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文史资料作为历史经验的实录,为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提供了生动、具体、翔实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材。青年文史读物《纵横》杂志以其真实的史料寓教育于事实的手法、朴素无华的文风赢得了广大青年的好评和欢迎。文史资料提供的科技、工商经济方面的资料,虽然为数还不算多,但它为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第三,实行全国一盘棋,把全国政协与地方政协的文史队伍的力量组织起来,对分散的文史资料进行系统化、专题化整理,如对第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资料就是采取这种办法整理的。这既加速了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之间的联系与协作,避免各自为战,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又能较快地为社会提供较系统的资料,对于进一步促进征集(拾遗补缺)也起了很好的效果。第四,开辟了向港、澳、台及海外征集、交流文史资料的新途径。这不仅增加了资料的来源,而且对增进在海外的炎黄子孙的向心力、促进祖国统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六届政协文史委员会在五年中,共征集资料4253万字,编辑出版各种书刊120余种,并初步建立了政协系统的发行网络,为传播精神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共十三大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七届政协常委会和主席会议的具体领导下,本届委员会要在发扬上届委员会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作出重大成绩。为此,特对近期工作作如下安排:

(一) 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作用，使委员会真正成为领导文史资料工作的经常性的工作机构。

委员会的职责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工作总则的要求，以及常委会、主席会议提出的文史资料的工作任务，制订各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工作部署；组织本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充分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社会关系，开展征稿活动，并视业务需要，组织适当的专题进行编纂工作的指导；定期听取文史办公室的工作汇报，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有关文史工作的活动，向有关人士通报情况，征询意见或举办有关问题的讨论会、交流会、联谊会等。为了调动每个委员的积极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根据工作的需要，拟在文史资料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军事，工商经济，科教文，民族宗教，港、澳、台及海外五个小组，由副主任分工负责，每个委员参加一个小组进行活动。各小组按照本委员会的工作方针和工作部署，负责组织本组范围内工作的进行。

(二) 搞好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征集工作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基础，亦应同历届文史委员会一样，把征集工作摆在首要位置。鉴于目前一般稿源已日趋减少，今后除某些薄弱环节继续实行广征博采外，应有计划地做好重点征集工作，特别要做好重点人物的资料“抢救”工作。

1、上届委员会曾向全国政协委员发过一次征集调查表近2000份，反馈近千份，对其可提供有价值资料的，应抓紧进行征集。此外应向本届有阅历的新的政协委员再发一次调查信，摸清情况，有计划地进行征稿。

2、对于上届委员确定的近200人的资料“抢救”名单，要进行整理、修订、补充，对自愿并有条件者，逐个加以落实，争取在近二、三年内把他们的资料“抢救”到手。对于撰写有困难的，由文史办公室与有关部门协商，组织力量，予以帮助。

3、根据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当前重点抓好教育、科技和工商经济史料的征集工作，这是文史资料的薄弱环节，也是可供现代化建设借鉴的重要资料。

4、以编带征。目前，可以根据我们拟定的编辑选题，摸清库存的资料的底数，找出空白和不足，挖掘征稿对象，有计划地进行征集，以达到专题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于自发来稿，要加强研究，以便从中发现重大线索，及时联系，以挖掘更多的资料。

5、加强横向联系，与史学部门、教育部门搞好协作，达到互相交流、互相支持的目的。

6、要加强民族、宗教史料的征集工作。

7、创造条件，建立起声像口述资料的征集工作。

(三) 积极稳步地发展港、澳、台及海外征集、交流工作。这是开辟文史资料稿源的需要，对于团结海外人士促进祖国统一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目前，这项工作方才起步，有一定难度。如渠道如何疏通，特别是征集对象和题目如何确定，要注意哪些政策和方法，都需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

(四) 做好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提高出版质量，要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本届委员会近年主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编辑出版工作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1988年9月9日省政协六届二次常委会通过)

主 任 李玉秀

副 主 任 郑南宣 朱士嘉

朱 雷 鲁永成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毕祖荫 华士煌

汪 诚 宋恒青

周云蒸 范宇豪

骆啸声 徐怨宇

湛宗仁 熊 辉

1、继续完成《文史资料选辑》1—100辑合订本的重印，争取年内全部重印完毕，并发到读者手中。

2、与全国各地文史委员会合编的《文史集萃》合订本，是和《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的配套工程，年内应有一个初步眉目，争取三年内完成全部工作。

3、继续搞好《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要重视稿件内容和史料价值。

4、对原来计划中与地方政协协作的专题资料，要尽快完成，尽快选订一批对现代化建设有借鉴作用的书刊选题，组织力量完成。

5、办好《纵横》，要扩大选题范围，扩大作者队伍，更好地发挥向青年读者传播历史知识和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

6、办好《文史通讯》，使其真正发挥交流经验，指导工作的作用。

在目前纸张紧张，发行困难的情况下，本届委员会要特别注意提高书刊质量，以质量赢得读者，同时从各方面疏通渠道，以缓解发行难的问题。

(五) 争取年内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以解决海外征集、民族史料征集等问题。

(六) 为了实现上述各项任务，要进一步加强文史办公室和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工作。根据以往经验和新的情况，搞好内部的分工合作，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改善经营管理，同时请政协给予物质上、财政经费上的必要支持，以克服困难，开展工作。

六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本刊讯〕1988年9月16日上午，六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政协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文史委员会主任李玉秀同志主持，韩文卿副主席到会并讲了话，文史委员会的四位副主任及委员共13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和通过六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简则以及关于近期文史工作的安排；2、文史办公室改行事业单位的问题；3、编辑湖北近代史料集萃的问题；4、筹备成立湖北省暨武汉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的问题；5、如何疏通发行渠道，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出版物的社会及经济效益的问题。

委员们就上述问题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综述如下：1、要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作用，有关文史资料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问题，要经过文史委员会讨论决定。2、涉及文史资料发展的方向问题，如事业化问题，经费开支问题等，由文史办公室拟出专门方案，经文史资料委员会讨论后报请省政协主席会议批准，然后实施。3、1988年着重解决好文史资料的发行问题。首先要确定1—2个年轻、肯干的发行专职干部，然后逐步解决发行所需的运输、交通工具，以及场地等问题。

委员们还就如何提高文史资料出版物质量、进一步加强与文史委员的联系，加强文史资料部门同学术单位、图、博、文部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联系与协作广泛发表了意见。

六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发言摘登

韩文卿：今天的会是本届文史委员会组成后的第一次会议，各位委员正式见见面，一是宣布六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成立；二是讨论一下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长计划、短安排，特别是近期准备抓的工作。主席会议分工由我抓文史工作，我希望抓好它，但我过去未接触这方面的工作，要好好向同志们学习，共同把文史资料工作抓好。

鲁永成：《湖北文史资料》的出版工作，开始是不定期的，1986年改作季刊，已出24辑，还与有关单位合编了四个集子，目前库存资料约2000万字，其中辛亥革命的史料较丰富，北洋军阀时期的比较弱，大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也不太充实，抗战时期的史料，前一段时间作为重点“抢救”，已出了七个专辑。总的来说，军政史料多一些，其它方面的较少。明年准备出湖北解放四十周年专辑、湖北近现代名人专辑、北洋军阀史料。另外还考虑了一些专题。文史办从1986年开始办了个《湖北文史通讯》，由于通讯网不健全稿源

较少，质量不高。要办好不容易，今后要进一步努力。办通讯的目的是想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并能对全省文史工作起点业务指导作用。目前市、县一级大多都出版了文史资料，其中有些市、县的文史资料办得较好，有一定的影响。1987年元月在当阳召开全省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以来，文史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形势是好的。

下面提出四个问题请委员们审议：1，把省政协文史办公室改行事业单位；2，编辑一套地方史料精选丛书；3，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学会；4，办一个文史书店。

郑南宣：文史资料委员会是工作机构，要明确委员们的分工，委员会与文史办公室的分工，切实发挥委员们的作用。《湖北文史资料》仅靠文史办公室几个干部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力量。文史资料的出版要把好“三关”，靠谁把关？要靠熟悉历史的老人和文史委员把关。

毕祖荫：湖北文史资料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点，而湖北最大的特点是辛亥革命。有些朋友到湖北来参观红楼，只有一些图片，这是很不够的，要尽可能把这方面的资料搞完整。因此搞丛书，是否可以搞辛亥革命丛书。

湛宗仁：编写文史资料从统战角度考虑外，还要从一国两制的角度来考虑。胡秋源是个湖北通，他主办了一个《中华杂志》，在海内外很有影响，要很好地利用、研究这个刊物，将会对湖北的文史资料发展很有利。

文史资料工作是事业性工作，而不是行政工作，将文史办公室改成事业单位，我很赞成。《湖北文史资料》还应突出经济方面的内容，湖北的近代文物、遗迹也要整理出来，要图文并茂。对敌伪资料、港台资料，选出精华，编成专辑，使其起到统战、教育的实录作用。

可以在邻近省份选择发行点，建立搞横向发行网的联系，选择恰当的人实负其责。办文史书店好是好，但需要经费和人员，其难度不小。

范宇豪：工商经济在湖北文史资料中是一个薄弱环节，省工商联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研究湖北近代经济，离不开湖北的大资本家和大企业。如裕大华在用人的管理上很有一套，若发表类似的资料，可作为当前经济改革的借鉴。湖北的拳头产品很多，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也很有必要。历史上商会究竟起过什么作用，文史资料需要研究，工商联可以提供资料。

骆啸声：湖北除了辛亥革命外，武汉国民政府应摆在同等地位，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文史书籍为什么销路不畅，我想是否与销售渠道不多有关，是否可以把《湖北文史资料》对外发行，我有些亲友与同学在海外，我可以通过他们帮忙做些工作。

朱雷：现在强调近、现代史的研究，重视地方史的研究，要把高校的老师、研究生、大学生这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利用起来，而这得靠政协文史委员会来协调这方面的工作。文史资料强调“三亲”，但文献资料也要搞，可以利用高校力量先编目。

文史委员会起的是领导作用，文史委员不可能面面俱到，也要有分工。

周云蒸：文史资料要搞好，印刷厂很重要，要争取有自己的印刷厂，还要注意编辑质量。

李玉秀：上次的主任会议上，讨论了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组织简则，今天又讨论了文史资料工作的近期安排。定了制度，就要坚持，委员会成立就要发挥作用。涉及到改革与发展的问題，要一件一件地办，办一件成一件。发行问题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可以先办。文史办改行事业单位、协作出专题、成立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审费、稿酬等问题要一个一个地拿出方案来。文史办公室本身的制度、方法也要拿出方案来，然后再提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宜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根据1988年工作计划,发扬开拓精神,广征博采,截止今年上半年,已征集稿件35篇,九万多字。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重新修订征集提纲,为业余文史通讯员撰稿提供较为详尽的线索。根据1988年工作要求,拟在三届委员会期间搜集编印《宜城近代史资料》和《抗日战争在宜城》

两本文辑。为了筹集稿件,我们在走访了三亲老人和史志等专业部门,在原有“征集提纲”的基础上,进行充实修订,重新整理,使原来的征集100题,增加到19题。虽然对时限要求没变,但使征集的内容更广泛、更具体了,有些条目直接点出事件的主要内容、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对象(包括核心人物)。如“征集提纲”第十九题写道:1927年元月1日,国民党宜城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成立及在县高等小学堂操场举行北伐祝捷大会等情况,距今已51年了,能否把这一题目要求的内容征集到手,我们开始也没有信心。

但是“提纲”发出后不久,一位七十八岁名叫姚吉成的老人经过几次联想,终于回忆出当年宜城召开北伐胜利祝捷大会时的情景,连会场两侧悬挂的对联的内容也没有漏掉。

二、采取多种措施,动员三亲老人回忆史料。春节过后,我们对全县的三亲老人进一步进行了摸底。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三亲

老人在过去有的受过磨难,有的做过一些于国于民不利的事,现在叫他们写出来、讲出来,是有顾虑的。对此,我们在政协主席、秘书长的支持下,与城关政协联络处共同做工作,给他们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帮助,工作上支持,业务上指导,使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敞开紧闭的心扉。如在解放前任过旧职的邱德诸老人,知道宜城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前几年我们去找他,他总是以“不得闲”和“忘记了”搪塞。今年,我们采取迂迴战术,多次与之接近,关心他,帮助他。他病了,我们派人带上礼物和城关政协联络处的负责同志前往探视,对他的病情给予关注。由于多次往访,终于感动了他,说待病一旦好转,即为我们口述资料。其次,对这些老人反映出的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耐心地听其讲述,回来后与领导汇报,对有些不符合政策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就给予委婉明确地解答,问题虽然没解决,但却起到“好话一句三冬暖”的作用。此外,在工作上给予热情支持,如发送稿纸、笔记本,登门赠送有关书籍和史料等。总之,

“以诚相待,金石为开”,由于我们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一些不愿开口的老人终于慢慢开始为我们撰写和讲述史料了。如参加“四·六”暴乱,人称张经武随身副官的邓宗彪老人,我们第一次去找他时,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要交待的都交待了,现在没啥说的。”后来,王孔庚副主席亲自带领文史干部登门拜访,并对他过去的情况给予了中肯地评述,使他感到王孔庚同志的话通情达理暖人心,遂慷慨答应为我们讲述“四·六”暴乱的情况。他白天摆摊做生意,晚上到政协为我们讲述史料,对“四·六”暴乱的前后经过说得非常详细。

密切各方联系扩大征集渠道

宜
城
县
政
协
文
史
委

三、依靠基层，协同作战。随着政协工作的纵深发展，我县在三届委员会期间建立了乡镇级政协联络处。根据这一特点，我们改变了过去那种抓面不抓点的做法，把面上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交到联络处去做，文史委员会腾出人手抓重点人和重点史料的征集，较好地解决了过去“面上抓不好，重点抓不到”的问题。

首先，发挥政协联络处的作用，抓好乡镇级史料征集工作。今年上半年，我们先后深入到城关、孙河、孔湾、王集、李湾、刘猴、小河、朱市和郑集等乡镇联络处，组织并督促其抓好乡镇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如城关镇成立了业余文史征集小组，并规定每月召开一次文史会议，联络处下季度对业余通讯员进行一次探访，以增加联谊；孔湾镇联络处主任张全善、副主任黎新忠，先后对全镇的四位三亲老人登门走访，了解情况，疏导思想。他们在走访中，了解到太山庙退休干部何庆元老人因去年党史部门有一篇史料牵涉他，思想不通停止了撰稿，张全善同志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对其进行了解释，使其冰释前嫌。此外，他们还拿出80多元钱为这些老人买笔、墨、纸等，为老人们撰写史料提供方便条件，现在这个乡镇的四位老人已分别写出了史料初稿。

其次，抓好重点史料的征集。由于发挥了乡镇联络处的作用，有人抓基层史料的征集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因专职干部少而出现鞭长莫及的矛盾，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搞好重点征集。城关是历来发生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也是社会名流群居的地方。因此，我们将征集重点放在城关。除要求城关联络处组织力量征集外，文史委员会另派专人进行直接采访整理。经过努力，仅数月的时间，

我们直接担任采访整理的史稿达十多篇，占史料征集总数的三分之一。

四、协调各方关系，扩大征集网络。文史资料工作关键是征集，这是个基础。只有把资料征集到手，才能谈及选编和出版。为了使征集工作能够得到正常的延伸，就必须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多方寻找藏宝人。对此，我们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联系，函征稿件。半年来，我们给在省内外知情人写信58封，收效较好。如当年跟随张自忠将军在宣城战斗过的栾生堂老人，一次给我们寄来了两万多字的史料，这篇史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当年国民党部队在宣城和在宣城周围的抗日战斗场面；原在宣城工作过，现在邵阳地区竹溪县的柳汉瑜老人，为我们写来了《创办新〈宣城民报〉的经过》一文。二是拓宽史料内容限制，对外地人在宣城的事和宣城人在外地事也列为我们征集的范围，从而扩大了稿源。如曾任国民党参政会议员，现旅居香港的朱慧清老人，经过其亲友的函介，陆续为我们写来了他与少帅张学良等人的交往以及其它社会活动史料。三是向港、澳、台同胞征集史料。随着大陆政策的开放，我们紧紧抓住三胞回归探亲的大好时机，将征集史料的触角伸向海外，也起到较好的效果。如孔湾人，现旅居台湾的老报人徐文秀先生，经过多方沟通渠道，他将搜集整理的达十万多字的《张自忠传》寄给我们，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张自忠将军提供了大量新的史料。四是密切邻县和县内兄弟单位的关系，继续取得他们的支持。我们在重新整理征集提纲时，县地方志将存编的宣城大事概要草本提供我们参考，使我们顺利地较全面地编出了新的征集提纲。

把握政协特点 发挥本地优势 开展文史资料工作

南漳县政协文史委 查代安

为了迎接南漳解放40周年，今年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是征集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元至八月，已征史料32篇，12万字。编辑整理15篇5万多字。油印《南漳文史资料》6期，3万多字。

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一、依据统战特点和本地特点选题：

解放战争时期，史料的主体是武装斗争。党史、地方志、政协文史都不能离开这个主体。但各自选择的侧面应有所不同。政协应把握好统战这一特点，从本地的“史料资源”优势出发，考虑自己的征集范围。依据这一指导思想，我们选定了“民变武装史料”和“匪患与剿匪史料”这两个侧面。

在解放战争中，南漳没有重大的战役。但是，这一时期，南漳山区反对国民党暴政的民变武装蜂起，多时达20余股，2000多人，他们抗丁抗粮，袭击国民党乡公所，参与了摧毁蒋家王朝的斗争，我党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团结、改造、收编了大批民变武装，为开闢新区，解放全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解放前夕，南漳山区也是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反动股匪最多的县。匪患使山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武装在南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在剿匪斗争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选定以上两个侧面，我们征集到一大批

史料。如《徐楚伯部收编前后》、《从民变武装走向革命》、《开辟汉南、收编民变武装之经过》、《山寨王——杨黑子》、《歼灭曾庆烈股匪》等都是较有价值的史料。

二、通过多种渠道捕捉史料信息

为了更多了解史料的知情人，我们采取了召开文史座谈会提线索；个别走访摸线索；多方发函找线索；档案部门查线索等方法捕捉史料题目和知情人。今年上半年我们先后在城关、武镇两地召开了两次文史座谈会。会上提供史料题目60多个，知情人42人，线索80多条。我们还对本县内的26名知情人进行了走访，对156名解放战争时期在南漳战斗过的而现在生活在外地的知情人进行排队摸底。并登记建卡，以便专程采访和书信联系。还在党史办、方志办、法院等部门查找到了当时的敌伪档案。法院匪首宗卷和我党干部当时的日记等。通过这样作，不仅查找不少史料线索，而且找到了一些旁证材料。

三、以“三亲”为征集重点

解放战争时期的知情人虽多数还健在，但都已年过花甲。为了更多地征集这一时期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狠抓了“三亲”史料的“抢救”工作，在抢救“三亲”史料时，把征集的重点放在亲历者身上。我们今年上半年征集整理的15篇史料，全部是“三亲”史料，其中有12篇是亲历者回忆。我们还找到了南漳最大的一股民变武装的大队长，

73岁的王慈轩。经过几次登门拜访，终于取得了他的谅解和信任，为我们提供了“鄂西北独立支队”的详情情况，我们还找到了南漳解放时率先进城，参加剿匪斗争的南漳县第一任公安局长孙伟民（原荆州行署副专员，已离休）同志，他为我们详细叙述了南漳公安队清匪反霸的情况。

四、征集史料由县内向县外发展

往年我们对县内的知情人征集多，对县外的知情人征集得少。今年除对县内的26名知情人进行了专访外，还对生活在外地的知情人进行了排队摸底，分出轻重缓急进行征集。上半年我们先后对鄢阳、大冶、荆州、襄阳、谷城等地的知情人进行了函征面征。收集到“大刀会团总杨黑子”，“南漳公安队清匪反霸”，“沐浴三三完全小学”等有价值的史料。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看了《我所知道的“三三完全小学”》来信说：看了文史资料“三三完全小学”使我想起了那个自然的小山村。该文的作者是亲身经历，写的非常真实。文中提到的几个学生

我认识，将传给他们看看。

五、与史志档案部门密切配合

我们在征集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做到了与党史办、方志办、档案馆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互通有无。如我们征集到了徐楚伯的民变武装和王慈轩的民变武装的资料，而党史办也收集到了收编徐楚伯武装并在徐部当政委的吕玉民的回忆录和在王慈轩部当政委的王林的回忆录。两部分史料，互为补充，相互印证。使民变武装的史料更为完整。更为真实准确。我们在采访孙华民时请他谈南漳公安队清匪反霸的情况，他对多年前的事件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的人数都记不准了，后来我们在党史办找到了他当年的日记，和当时的敌伪档案资料，使以上模糊不清的地方得到了证实。

今后我们将继续重点征集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同时兼顾征集民国时期的文化、教育、经济等史料。争取在明年国庆节前出一本南漳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

标点符号歌

一句话说完，划个小圆圈“。”（句号）
中间要停顿，圆点要带尖“，”（逗号）
并列词句间，点个瓜子点“、”（顿号）
并列分句间，圆点带逗点“；”（分号）
引用原话前，上下两圆点“：”（冒号）
疑惑与发问，耳朵竖耳环“？”（问号）
命令与感叹，滴水下屋檐“！”（叹号）
引用特殊词，蝌蚪上下窜“”（引号）
文中要注明，两头各半弦“（）”（括号）
转折或注明，一横写后边“——”（破折号）
意思说不完，点点紧相连“……”（省略号）
特别重要处，字下加圆点“.”（着重号）

我县1987年文史征集工作是怎样突破百万字大关的

浠水县政协 江势涛

我县文史征集工作，在1987年有突破性的进展，仅一年时间，就征集稿件195篇，近100万字，印发35期活页期刊，出版了《浠水文史资料》第一辑铅印本，我们是怎样达到这个目标的呢？

第一：思想认识一经提高，步伐就大大加快

从前，我县文史工作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组织不落实，工作无人负责。一九八七年省政协在当阳县召开的文史工作会议，我县政协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有些领导的报告和先进县、市的经验介绍，思想受到很大启发。会后立即传达了会议精神并确定了专人负责，确定了工作目标。接着召开了有文史委员会成员和一部分年纪较大知名度较高的人士参加的两次座谈会，两次座谈会都由领导同志亲自传达精神，讲明政策，并对文史工作的性质、特点以及它与县志、党史的区别等专业知识进行学习探讨，在学习的基础上列出了写作编目，提供不少征集的线索，两次座谈会根据各人的情况自报编目96项约50万字，为征集百万字拉开了序幕，奠定了基础。在上述会议中，我们引导大家联系我县实际进行讨论，大大增强了思想上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概括起来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到我县有许多历史上的名人，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大书特书，二是对照先进市县的经验，感到已落后了，必须采取最有力的过硬措施，才能迎头赶上，三是认真分析了现存掌握史料较多的一些老人的状况，认为必须采取紧急的抢救

措施，否则损失就更加严重。如县政协委员邓谷先生是浠水大革命时期的活跃分子，以后又任国民党的两任县长，同时与石樵、陶钧等著名人物交往较多，掌握的史料相当丰富，但他年事已高（86岁）如不为他创造条件，把这些史料写出来，若出现不测，就会人亡史毁。

认识提高之后，措施紧紧跟了上来，除了充实机构，确定专人负责外，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同政府协商拨出5,500元作为文史专款，增编2人，并添置了必要的设备，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征集工作的开展。

第二，解放思想是征集工作的钥匙

在一年的实践中体会到，抓这项工作的同志的思想要解放，提供史料人的思想也要解放，他们思想不解放，拥有的史料再多，也不敢写出来。我们遇到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有争议的人物怎么写的问题。我们主要是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对他们的功过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如陶钧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在北伐中作战勇敢，邓谷老人写了他在九龙潭战役中的事迹，我们予以肯定，并说明我们并非以此肯定他的全部历史，又如曾任国民党浠水县党部书记长的钱守敬？他在四·九年参加了起义，这是进步的一面，同时在四六年他参加省参议员的竞选中创造了一段丑闻，他的妻子如实的把两个方面都写了出来，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二、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中有过进步表现、有的是我们在那个时期的抗战工作的作用，有的是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在写这些史料中有人怕说为国民党涂脂抹粉，有的事件与自己有联系怕说为自己树碑立传，对这类问题，我们再三讲明，只要史料是真实的，就应客观的予以肯定，大胆的提供这方面的史料，不要有任何顾虑。三、抓文史工作的同志，过去不敢同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接触，一怕说自己立场不稳，二怕这些史料不真实，三怕刊物用了这些史料在社会上引起反感。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结果，不加以解决就会出现梗塞，因此在工作中反复强调我们要敢于接触这些人士，而且在接触中要耐心的作工作，用他们敢于客观的写出重要的史料，在征集工作中我们注重于他们提供的史料的价值和真实性，而不是看他们的历史成分如何。由于这个问题解决得较好，先后有30多人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他们也感到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三、拓宽征集渠道，建立广泛的征集信息网络

我们在两次座谈会的基础上，根据与会人员提供的信息与有关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从而拓宽了渠道，而且建立了一个比较巩固的网络。这个网络一般由三条渠道组成，一是拥有一定史料的人员共140多人，这些人同我们有经常性的联系，其中有七人撰写的史料一年中都达到两万到七万字之多。我们拟用委员会的名义发聘书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准备分别聘请10名知名度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员为文史研究员，一般的聘为文史通讯员。二是参加县志、党史、工运史的编辑人员，他们起步早，长期从事征集工作，掌握有较多的线索，可以提供信息。有的征集到一些史料不属他们的范围，而恰是文史的范围，有的是一些老人的遗稿十分珍贵。如党史办的一位同志就向我们提供了十多篇，其中有闻振之的遗稿，写的是闻一多烈士的

事迹，很有价值。因此同他们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三是随着政协组织延伸到乡、镇一级，我县与乡镇一级普遍建立了政协联络组把征集文史工作列入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我们把掌握的情况和人员名单通知他们，希望他们建立联系，有的已作出了成绩。如巴河镇联络组为张永芳同志座谈、走访就提供了方便，同时他们自己组织撰写了五篇史料。目前这个网络已经形成。

现在第一辑铅印本已经问世（去年12月底出书，3000册已销售一空），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好评，在北京工作的陶钧的女儿陶育玉同志接到《浠水文史资料》第一辑后，感到非常高兴，当即给县政协原付主席吴仲介先生写信，信中说：浠水文史资料第一辑上那一篇关于我父亲在龙潭战役的文章，我已复印寄给在美国的弟弟，他会转给台湾的亲人一阅，……透过这些文例更深化了大家的认识，目前第二辑铅印已经定稿，即将付印。目前还在为建立一个发行网络努力。

汉字有多少个？

一七一六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加上一部分古代异体，合计四万九千零三十个）。一九一五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个，估计汉字约六万个左右（其中异体字约两万个左右）。绝大多数是现在用不着的古字和古异体字。一九七一年修订的《新华字典》收字八千五百个左右。一般估计，通用汉字在七八千个左右，常用汉字约有三千五百个左右。

对知情人要知情

襄阳县政协文史委

政协的文史资料是由近、现代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各项活动的亲自参与者、目睹者、耳闻者的回忆，或自己撰写成文、或口述实录整理成稿。而这些知情人中有一部分是在国民党方面从政多年。建国后，在历次运动中因受极“左”的影响，或多或少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他们中有些人以前没有接触过文史工作，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写。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

杨学端，生在襄阳，学在襄阳，长期工作在襄阳，可以说是个“襄阳通”，当然也是个襄阳文史资料的知情人了。我们通过多方面的做工作，他的爱国热情提高了，精神面貌变了，在一年时间内为我们提供了10余篇约3万余字颇有价值的文史资料。起初，我们通过他的乡亲张敬初——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编辑，让他写文史资料，他写了一篇。不久，张敬初跟他谈心，得知杨学端的独生儿子在外省工作，人老了风烛残年，诸多不便，总想儿子在身边。我们请统战部出面，发函给他儿子所在的单位，商调回原籍工作。原单位复函，说杨的儿子因工作需要，暂时不能调动。我们带上复函到家劝慰，杨深受感动的说，我受到党和政府这样关心，心中有说不出的温暖，确实感到党和自己是一家人了。又过了些时，张敬初与杨学端谈到人生的价值，杨老先生若有所思地说：“我来到人间，出生于故土，不能给家乡留点芳香，有何面目见祖先于九泉。”接着又说：“我在县城有一座房子，按照起义政策，主权应归还给我，我收回房产主权后，

以低价出售给国家，以得之款，捐献给本镇乡立中学，购买教学仪器。能如此，我百年去世之后，心也踏实了”。我们知道这事，便设法为他落实政策。由于诸多因素，事情至今尚未办好。但我们所作的努力，他是知道的，他对党的情更深了。又有一次，杨在文史委员会中闲聊说：“有些人怕写史揭了人家的短，将来国共第三次合作后，朋友们不好见面。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下一代见了，也会对撰稿人有反感的。”我们听了之后对这种想法作了细致的解释，说明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写史，寓褒贬于事实，就是后人看到，也会内心佩服的。杨的思想顾虑解除了，又奋笔直书了《李朗星外传》、《轰动襄阳的盐粮二案》、《我所知道的襄阳县银行》等几篇有价值的文稿。听说杨学端先生病了，我们带着礼品去看望。今年春节前，我们又去看望他。他表示要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有史料价值的东西全部写出来献给人民。

傅良能，枣阳人，为起义军人，曾在国民党第15绥靖区经济处工作过。我们登门拜访，向他介绍文史工作的情况，请他写点文史资料，他既没有表态允诺，也未直言拒绝。第二天傅君便乘车到杨学端君处，请教怎样写文史资料。傅向杨说：“我总得应付一下，哪怕几百字也好。写啥呢？你晓得我是个军人，有10句话，只说得出口。唉、唉、唉，怎么对付一下。”被张敬初知道，张便对傅说：“写你原在国民党第15绥靖区经济处工作方面的事情。”傅说：“那有什么可写的，是个空架子，没作出什么实绩。这个经济处不是办工厂搞物资生产的，是对共产党实行经济封锁的，不让食盐、医药……进入解放区……。”张说：“你说的，便是一个好资料。”于是傅君便把这一事实写出来了。这份材料有力的说明了国共两党之间在经济方面的斗争。

开拓视野 广征史料

孝感市政协文史委 李剑勋

去年,我市政协在当阳召开的全省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后,放宽视野、广交朋友,拓宽领域,广征史料,在九个月内,共征集文史资料221篇,556,000字,为1985年和1986年以每年征集史料字数的两倍,并第一次征集到来自海外的史料。

一、开拓视野 编出征集纲目

我们于1986年11月底着手将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间的关于全国全省和本市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按年代顺序编纂《孝感市文史资料征集大纲》,在《1987年文史资料征集篇目》中具体写明了114个史料征集篇目,从而放宽了视野,扩大了文史资料的征集领域,从而使史料的征集走向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文史委员会的成员以此为依据向社会广泛征集史料,各街、镇、区、场的政协活动小组都能藉此深入而具体地组织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社会上的各界人士也能毫无顾虑地动笔撰写亲历亲见亲闻的文史资料。孝感县、花园区原特赦人员李传云曾任国民党孝感县临时参议员,看到《征集篇目》后,就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孝感县临时参议会琐记》。白沙区政协活动小组负责人组织本区教师撰写在清廷都察院任职的高璧曾的史料。花元区政协活动小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按照《征集大纲》和《征集篇目》组稿15篇。目前征得的史料,上起1898年戊戌变法的史料,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史料,有革命史23篇,抗日史料30篇,工商经济史料26篇,文教科43篇,宗教、侨务等99篇,在这五类史料中撰写历史人物46人。

二、面向社会 广泛征集史料

我们于二月二十六日,发出了关于一九八七年《孝感市文史资料》第四辑征稿通知。在“年内征集史料3万字,上刊3篇”。孝感市在近现代史上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居于重要地位,已知的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相关的人物4人,辛亥革命前后的留学生二十余人,参加辛亥首义革命的二百人以上,特别是1921年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涌现了大批时代风云人物。我们认为要广泛而深入地征集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层次和各个侧面的文史资料,不能把视野只局限在几个笔杆子或十几个知情者的身上,必须面向社会。书院街、新华街、广场街党委和政协活动小组负责人以及工商联负责人分别多次召开了十余人以至五十余人的离退休教师、干部、职工和老年市民文史座谈会,叙谈近代和现代有关孝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文史委员会成员参与其间,共同研讨撰写文史资料的意义、作用、方针政策,时限、内容、重点,“三亲”特色和撰写方法,消除了与会者的疑虑,调动了“孝感通”撰写文史资料的积极性,并当场同单位负责人讨论决定撰稿人、撰写篇目、交稿时间和约稿人的“四个落实”,仅在这三条街道就发展组稿员三十余人。书院街杨家湾居民谢邦良和朱志平在孝感沦陷时期,曾任日伪时期孝感县长朱坤宇的贴身卫士,在座谈会上主动口述了有关史料;西外街高南翔原系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他在座谈会上感动地说:“现在把我作为团

结对象，主动同我们交朋友，交心谈心”。他放下了多年怕动笔的包袱，撰写了在1923年曾任湖北省水警厅长的熊祥生的长篇史料。三月九日，工商联召开的文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与会者达五十余人，三十多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冒着细雨赶去开会，商讨撰写近现代有关孝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到八月二十日止，新华街已交史料稿37篇，书院街已交史料稿23篇，花元区交史料稿15篇，工商联已交史料稿23篇。

三、约请名人撰稿，抢救重要史料

一九八七年上半年，我们向在武汉、北京、上海等地的孝感籍名人，寄去《孝感文史资料》，发出了一百多封约稿函，有的还专程登门走访，有的则送稿约请审改，几个月来先后收到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如中顾委委员郭述申，审改了我们寄去的《郭秀夫传略》，著名法学家、民革中央顾问杨玉清寄来了1948年他在孝感县竞选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以及在立法院外同蒋介石、孙科等人接触的活动的的重要史料。

我们又约请三十年代留学比利时，现为上海著名骨科专家余正起撰写了《旅欧十年回顾》上篇和续篇，续篇中记叙了有关吴玉章、杨虎城、韩素音等著名人物的史料。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信芳撰写了《留美二、三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总工程师李镇南，在1958年曾陪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视察长江三峡，其父李实茂系经历几个时代的历史人物。曾于1905年在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抗日期间任重庆国民党政府的中将高参，解放后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其二弟李超北系台湾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其三弟李定一系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教授。1978年和1980年曾先后回国访问和讲学。撰写李实茂的生平事迹，对发展对外统战工作，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协领导人和文史委员会干部曾专函特约他撰写他父亲李实茂的传略，并专程登门走访，他不久就寄来了他保存多年的其父亲的自传，和他撰写的他父亲的生平事迹。

四、着眼联谊，征撰交流史料

我们按照中共中央的“放宽视野、广交朋友、长期打算、以诚相待”的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向海外的美籍华人征集文史资料，并专门撰写了面向港台的文史资料，以增进了解，加强联谊，促进“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实现。

住美国密执安州公寓的张汉清，是我市朋兴区人，今年七十九岁。他在1947年曾任广济地方法院院长、南京最高法院推事。1949年任恩施高等法院院长，后不久由香港赴台湾任最高法院检察官，1980年退休。其子女均定居美国，加入美国籍，我们通过他在国内的亲属同他联系，已寄回他的生平事略，并表达了怀念祖国之情，愿为海峡两岸“三通”，为统一祖国的大业作贡献。前不久又寄回了他生平事迹的补述。

郑逸侠曾任“中国土地银行”经理，系孝感朋兴区郑家阁人，1946年在湖北曾任国民党省财政厅长等职。1979年在台湾病故。他的四女郑嘉侠侨居美国。我们撰写了《郑逸侠传略》对他一生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屠义方在台湾任“文化复兴委员会”执行秘书，系孝感城关中山街人。我们为其前辈屠仁守撰写了简明的史料，在肯定了他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适当指出了他的某些消极影响，这对增进海峡两岸的互相了解是有所裨益的。

为了服务于经济建设，为当前的经济工作提供历史借鉴，我们依靠工商联发动原工商业者撰写了工商经济史料28篇。

核实文史资料管见

张 敬 初

文史资料的真实性强，透明度高，囊括面广。要做到文史资料有高度的社会效益，首先必须核实好文史资料。这里我们以近几年实践为基础，谈谈对于核实文史资料的做法。

史料为什么要核实呢？其一，政协文史资料除极少数来自档案外，绝大部分来自个人的回忆，回忆难以避免不准确之处。其二，认识有片面性。这个片面性，有的来自个人的认识水平；有的来自写史的人自身的某种考虑。其三，个别写史人好哗众取宠。说好的，好得出奇；说坏的，坏得漆黑。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文史资料要核实。

怎样核实史料呢？总的原则是：（1）编史的人要掌握大量的史料，多在史料的海洋里遨游，从中审度某种事件的虚实及其可靠程度。（2）编史的人要有多方面的生活阅历以及近现代史的知识。（3）编史的人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还要有合适的核实方法。我们常用的核实方法有四种。

第一、自我核实法。自我核实就是写史的人自己核实自己所写的史料。当编辑人员要采用某篇史料，而这篇史料尚有不详实或待斟酌之处时，编辑人员可退还原稿，指出某些情节、时间、地点、人物待商榷、补充，要求作者自己核实。如有可能，附寄有关史料，供他参考。使用这种方法有两个好处：一是作者对于自己所写的事件熟悉，知道要查找什么人，查找什么史料做佐证，怎样查找。二是编辑人员省时省事，避免作者

事后提出不同意见，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做到史料求实存真。举例说，我们编辑辛亥革命史料时，有一篇《光复襄阳的张国荃》的史料，这篇史料中说：1911年11月28日光复光化，光化光复后，又招兵，改编清军，竟于“29日”夜兵临襄阳城下，“30日”就光复襄阳。光化离襄阳180里，事仅隔一日，就做了这么多事，走了这么远的路，显然史料与事实不符。我们让原作者自己核实，结果原来是1911年11月“8日”光复光化老河口，作者把“8日”抄成“28日”了。关于史料的人名、地名、时间写错的情况特多，然而最多的是日期记不清，作者常用“大约”、“可能”、“也许”等字样，来说明自己记忆模糊。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求作者最好能肯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如果日期记不清，最好能肯定上、中、下旬，或月份，或季度，或年代。连年代也记不清，就很难算一份事件确切的史料了。

第二、客体核实法。所谓客体核实法就是除作者以外的第三者核实的方法，包括集体、个人核实在内。编纂文史资料的人不是万事通，你没有做过某类工作，就不会知道那行工作的底蕴以及它的精当奥妙之所在。社会上的事既是那样多层次，那样纷繁复杂，则编者就很难窥其全豹。所以编史者，遇到真伪莫辨的史料，就要借助外力，求内行审阅，提出意见，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冷门史料如帮会、丐帮、妓院；专业史料如科技、宗教、华侨、黑漆史料（来源于黑社会）如走私、贩毒、赌窟、杀人团伙等等，

这些史料的可靠程度，非内行就难辨真伪，所以要求内行核实。即使是一般性史料，有时也会令人不解其中味。例如我们得到一篇史料，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师、团级干部，都喜欢打仗，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开始，我们对这种说法很不理解。以后我们遇到一位国民党粮政官员，他说这种说法是对的，理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官绝大多数都吃空额，虚报兵员数目，除贪薪外，还贪一分口粮。这些浮领的口粮，平时谁也不敢动，也不敢拿到市场上出售。可是一打起仗来，军队就会借口部队转移，战斗频繁，粮食不便携带，要求地方政府以低价收购，以免资敌。这样就把空额口粮，变成现金，装入腰包私分了。运用客体核实这种方法多半是召集知情人、内行开座谈会，或是个别访问，运用什么方式得休，要看具体情况行事。个别访问，可以畅所欲言；开座谈会，可以互相启发，引出问题，集体思考。

第三，以史核史法。所谓以史核史法，就是用档案史料和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以及在一个地区国共双方素负声望的人士，社会贤达所写的亲历、亲见史料去核实一般的三亲史料。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谈。

用档案史料以及其它各种体裁（如日记体）史料，去核实文史资料，这个办法很好。但不是一切史料都能得到档案史料的印证。档案史料只能核实一个地区的某种事件。但记载较为简略，一般只能定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主要当事人、结果，只能对文史资料起到佐证作用。

其次是用亲历史料去核实亲见、亲闻史料。一般地说，亲历史料比亲见、亲闻史料

精确度高些。例如我们文史资料第三辑中的《火烧三李》这篇史料，就得到曾任襄、枣、宜县委书记马兆祥所写的亲历史料《战斗在襄枣宜的日子里》的印证。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就不一一枚举了。不过以史核史，要以职务较高的、记忆力较强的老同志和重要知情人所写的史料为准。不要以糊涂文去判断糊涂案。

第四、揆情度理法。揆情度理法就是按照情理来估计，推测当时是否有可能发生这件事。用这个方法来核实史料，就要把具体人、具体事、具体情况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研究。采用这个办法，宜集体研究为佳，要请接近那个时期的、头脑清楚的、有文化的、阅历丰富的老人去研究。值得提出的是，用这个办法去核实史料，准确性较差，因为世界上的事，“一般”里总有“特殊”。叙事时不宜绝对化，允许多说并存。

我们曾用这个办法，核实过一份文史资料。这份资料中说，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整编20师150余人枪，住襄阳东乡王河，一天倾巢出动，去扫荡大埠街的解放军民兵武装。结果被埋伏的30余民兵以及在场逃难的群众全部俘虏。对于这件事，有的说，不可能。因为该部是国民党正规军，素有战斗经验，武装精良，且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有的说，可能。因为48年7月，国民党襄阳的第15绥靖区部队全部被歼，司令官康泽被俘。此时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虽占据襄阳，但已如惊弓之鸟，在接近解放区有群众助威而又摸不清底细的情况下，正如前秦苻坚肥水之战，视草木皆类兵，因而被俘了。我们审度情况，采用了第二种说法。